

第二十五章

混过“鬼门关”

我的这间软卧车厢左右上下有四个铺位却进来六个人。其中一对年龄不相称的夫妇是短途，要在天津下车。那五十多岁的男人趾高气扬，大概是伪政府的什么官老爷，官僚架子抖得满车厢一股陈腐之气，叫人厌恶。陪着他的年轻女人搽胭抹粉，穿着花哨，俗不可耐。按年龄应该是他女儿，但从举止言谈上可以断定是他的小老婆。另一对儿六十多岁的老夫妇是日本人，自称“岩本”，待人非常谦恭有礼。可惜两位老人的铺位都是上铺，我主动地把自己的下铺让给了老太太，顺手把自己的小皮箱扔到了上铺。老太太连连哈腰致谢，说了一大堆祝福旅途平安的吉祥话。

两位老人要在“新京”（长春）下车。到北平是为了探望在军中服役的儿子。遗憾的是，只在城郊部队的营地和儿子见一次面，第二天部队就开拔了。据他们说，如今北平城内并没有什么日军，只是在长辛店一带驻有一个师的日军后备部队。整个华北的“皇军”主力全开赴太行山前线了。老

两口子在北平游览了几天名胜古迹，又惦记着“新京”的买卖，只好赶回满洲了。

另一位身着“满洲国”协和服的汉子有五十岁左右，自从上车以来一言不发，一直在自己的铺位上面面向窗外呆坐，愁容满面。我从他携带的公文包上判断，此人一定是首都“新京”的政府官员，职位不低。但为何如此愁苦，可就不便过问了。

夜色如漆，列车像脱缰的野马在狂奔。

大约晚九点左右，到达了第一个大站天津。那一对老夫少妻挽臂下了车。闷热的车厢变得宽敞，凉爽了不少。那位日本老太太已在下铺睡下了。我爬到上铺却无法安眠。已超假四天了，我的逃亡罪已定，回去如何保命过关是摆在我面前的最大问题，让我怎么能睡得着哇？

午夜时分，车到“山海关”。两个星期前，我满怀希望闯过这道古往今来兵家必争之地的鬼门关，来到华北。如今，却一无所获，像一匹出山觅食的草狼又瘪着肚子、夹着尾巴溜回了山林……

列车停下后，月台上又是一番混乱、嘈杂。旅客们又被赶下了车，接受例行检查。我们这节卧铺车厢的旅客不必下车，可以留在原位受检。车门开处，传来中、日两个列车长用不同语言的喊声：“请把车票和证件都拿出来，检查了！”

通道传来军用大皮靴的踢踏声和狼狗低沉的咆哮。十来分钟后，一个日本宪兵伍长（下士）和一个上等兵牵着两条军犬来到了我们的铺位。首先是两个日本老人递上车票和证件，接受检查。然后那个沉默寡言的高等官拿出了自己的车票和证件。那个宪兵伍长仔细地检视了一番带照片的身份证，又看了看一张证件似的公文纸。我侧眼望去，上面果然

有“满洲国”国徽的章记。最后那伍长就一言不发地转向了我。我端坐着递上了车票和卧铺票，另一只手放在衣袋里，准备掏出证件和“护身符”名片来。对方反复地看了那张盖着“军用割引”字样的车票，问道：“出张（公出）吗？”我回答：“哈依。”两个宪兵怔怔地看了我一眼，连证件也没要便牵着狼狗往别的铺位去了。我暗暗松了口气，点上一支烟慢慢抽起来。

换过了车头的列车好像加快了速度，如今它已奔驰在东北大地上。故乡的风已吹进车厢，使我的心潮得到抚慰，渐渐平静下来。

躺在铺上，霍大姐和崔婕的影子又浮现在脑海，想到这两个女人的姓氏上，一个是“雨”，一个是“山”，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啊！已经预示了我此行的不顺。但这两个姓的下边却都有一个“住”字，是否昭示着我回来后能逢凶化吉的结局呢……但愿如此。老天保佑吧，让我逃过这道难关。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渐渐在我心中酝酿成熟……是的，这是惟一可行的办法了。策划已定，心中稍安，困乏已极的我渐渐睡着了。

早晨醒来，列车已越过了锦州奔向东北重镇奉天了。从上车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十五六个小时，腹中滴水未进，但并无饥渴之感。列车上小卖的姑娘送来牛奶和面包。在她的一番劝诱下，我们四个人每人都买了一份早点：一杯热奶，一小块面包，共五元钱。这五元钱差不多能买两袋洋白面，但是在列车上挨宰也得认可，历来就是这样。

一夜加大半天的食宿相聚，那位沉默寡言的官员终于开口与我搭上了话。大概离家越来越近，他脸上的愁云渐淡，主动向我谈起了去北平的缘由。

他姓端，自称是清王朝端亲王的后裔，与“满洲国”皇上溥仪平辈，在首都国务院内务部工作。此人仪表堂堂，举止庄重，用简练的语句低声向我叙述了心中的苦恼和惆怅。

原来他有一个独生子，二十四岁了。在北平清华大学理工科读书，今年就要毕业了。本来这孩子满可以在“新京”读建国大学的新民学院，毕业后高官厚禄在等着他，可他偏偏选择了清华，让他这当爹的百思不得其解。一个月前，清华大学以日本人华北教学顾问的名义通知他：儿子失踪了！

这晴天霹雳使他六神无主，立刻请了假匆匆赶赴北平，来找儿子。这里本是他的老家，有许多皇亲国戚，亲朋故旧，但是多方查访儿子仍然音信皆无。在清华园中，教授、讲师、同学们的谈话很不一致。有的说：“端×大概去了重庆……”有的则说：“学校当局认为他是共产党，思想左倾，去延安的可能性最大……”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难怪他这当爹的心情沉重，愁容满面了。

火车在奉天要停车十五分钟。这里是哺育了我的故乡，我的童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。“九·一八”那年我刚刚十一岁，就在这里我亲眼目睹了日本兵拥入奉天城，太阳旗高高挂在了城门楼上……十四年之后，我又目睹了这面太阳旗——“日之丸”的坠落。

车到首都“新京”，日本老夫妇要下车，端先生也拎起了公文包。我恭恭敬敬地将他们送到了车厢门口，互相挥手道别。

下车的旅客很多。我估计隔壁软席车厢里的人不会多，要比这亭子间似的软卧车厢宽敞、亮堂些，便提起小皮箱转移到了软席车厢里，找个空位坐了下来。

窗外的太阳已经偏西，熟悉的双城堡车站映入眼帘。这

里的一切景物似乎都在嘲弄着我：“喂，你小子赤手空拳地又跑回来了？”心潮起伏，心乱如麻，归心似箭，三股心绪拧成一条绳子勒得我透不过气来。以至对面坐着的一个女人连问了我三句话，我都和没听见一样。为了礼貌，我不得不定下神来听她东拉西扯。她自称××松子，虽然日语纯熟，但我还是从其尾音中嗅出了点什么。哼，关公门前耍大刀。我断定这也是个刚刚改了日本姓的朝鲜人，原姓李，“松子”两字即是李字的分解。她说自己是道里区中央大街“松浦洋行”三楼的支配人（经理），很客气地告诉我如果买手表、眼镜之类的东西一定去找她，价格从优云云。我哼哈地应着，根本没情绪和她多聊。见她如此热情，我反倒疑心这女人是否发现了我腰间藏着的金元宝，要伺机行窃？

列车在夜色中进入了终点站哈尔滨。乘客几乎走空。而我的下车地点则是火车回“三棵树”车库必经的小站“滨江站”，下车步行两三分钟即可到家。但火车在这终点站要停上二十分钟。火车头呼呼地喘着大气，像一匹跑乏了的野马。我心焦难熬，这二十分钟真比二年还长！探首窗外，霓虹桥伟岸的身影就在前面。站前“喇嘛台”正敲响了晚钟。列车终于在钟声里徐徐起动。钟声里，我虔诚地默默祈祷，主啊，保佑我的计划顺利实施吧……

我的“军用割引”车票仍然畅通无阻。冲出栅栏口，我大步流星闯入了家门。老爸老妈傻子似的怔怔地看着我，像看从天而降的陌生人。妻子扑到我的面前，身后是两位老人的哭泣声。我把手提箱往炕上一扔，一把扯下缝在腰间的小布袋塞给妻子，说：“这是给别人捎的东西，收好。回头再跟你说……”跑进厨房我匆匆擦把脸，梳梳头发，又迈出了家门。

我要抢时间实行我的第一步计划，闯过第一道鬼门关。扫了一眼挂钟，已是晚上九点十五分了。

在邻居赵大哥门前喊了声：“借一下车！”一辆破自行车已在我的胯下飞转起来，直奔上坎大道，急驰而去。

进入昏暗的小街，眼前出现熟悉的半人高的榆树墙和木栅栏门。内田公馆楼下无声无息，楼上却有灯光。我按捺着怦怦急跳的心房，气喘吁吁地用颤抖的手开始轻轻地敲门。终于，我听到了一个沙哑的声音：“哪一位呀……”

哦，这是我叫她“奥巴桑（大娘）”老下女的声音。打开带一条锁链的门缝，她立刻认出我来：“哎呀，是你……这么晚了？”我对着门缝双手合十，急促地道出务请见到小姐的请求。她将一根指头竖在嘴上，又关上了门。

三分钟以后，我听到了木屐声。多莎子只穿着一件花连衣裙，一下打开门闪了出来。她惊骇地瞪圆了眼睛，一言不发地拉着我的手来到了小院的矮树墙边。没容她说一句话，我已泪如雨下，哽咽着告诉她，此刻我非见她父亲不可！多莎子连连提问，带着惊恐。我的泪水分明滴到了她雪白的手腕上。她只说了一句：“稍等。我去看看……”转身像猫一样轻捷地直往楼上跑去。大约五分钟之后，她又出现在黑洞洞的楼门口，向我招招手并指指楼上，示意我自己上去。

我蹑手蹑脚地上楼。内田夫人在隔壁问谁来了，多莎子没有回答。我已敲响了内室的纸隔扇门，并报了自己的名字。

“进来。”内田顾问声音未落，我已出现在他的面前。

“顾问殿，我特来向您请罪……”我急步迈入室内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抽抽搭搭，眼泪落在凉席上嘀嗒有声。

顾问大人斜卧在厚厚的枕褥上，只穿了一件半截的寝

衣，敞着怀，下边露着长毛的肥腿，正在看报纸。他隔着眼镜看看我，又从眼镜框外边仔细地端详着我请罪的丑态。他一边合上报纸一边摘下了眼镜：“不许哭！一个男子汉，像什么样子……这些日子跑哪儿去了？混蛋！”

我像半截木桩戳在那里用哽咽代替回答。

“这边来，坐下！”

我忙止住啜泣，跪行两步凑到了他跟前。

内田把报纸扔在一边，盘坐起来，对外边喊了一声：“给我弄点茶来！”我回头发现多莎子正躲在门外偷听，很快，她就端进来一个小茶盘，又悄悄退了回去。

于是，顾问开始了非正式的审问。

我在火车上早已把逃命的理由编得天衣无缝，又将自己在副官处受到的排挤拼命夸张、申诉，让他明白我确实是事出有因、迫于无奈，加上年轻一时冲动才铸成大错。如今已经悔悟，这不，请罪来了……

老内田一边静听，一边喝茶。只插一句话：“你小子，月薪加上津贴已经超过满人上尉的收入了。他妈的，就是不知足……简直是瞎胡闹嘛，混蛋透顶！”像爹骂儿子。我则垂着头跪立，一声不吭，一副十足的奴才相。惊恐中，渐渐感到了一种解脱……看来，这条命似乎能保住了。老内田抽出一支香烟，我立刻机灵地抓起火柴给顾问大人点着了烟。

我见时机已到，忙掏出崔婕给我的“护身符”：香月增荣大佐的名片，递了上去。果然，这张名片引起了内田的兴趣。他接过去仔细观看，嘴里念叨着：“唔，这小子原来在南京。这么多年，他倒出息了。野小子……”原来，香月增荣大佐是内田顾问在日本陆军大学时代的同窗好友。大概是想起了多年前的学生时代，老内田笑吟吟地一言不发，捋起

了仁丹胡。我暗暗长舒了一口气，发现鬓角的汗水已流到了下颌上。内田按息了烟头，伸伸腿准备躺下来，顺口道：“滚吧，我要睡觉了……”。

我如获大赦，双手平放席上，嘴里喃喃地说：“一切罪过，全仰仗顾问殿高抬贵手了。”俯下身，深深地磕了一个头。

老内田又嘟囔了一句：“滚吧，明天再说……”躺下去了。我站起身，悄悄退了出去。

在门口，多莎子一把抓住了我，把我又拉回到院子里的小树下。

“左君，你真是太冒失了，干出这么大的蠢事！这些日子，我好像对你有预感的……”

我带着歉疚的语气向她解释，希望她和她母亲替我向她的父亲讨饶，说说好话，否则我就全完了！“我的小命就掌握在你手中，多莎子，看在我们友情的分上，请多劳神吧。”

我的眼泪又像自来水一样流了出来，打湿了我们拉在一起的手。门口站着的日本老大娘在悄声地招呼多莎子进屋去。我只好重复了一句一切拜托的话，便把她推转向了小楼。

黑暗中，我捞起扔在地上的破自行车，活像一条逃出命又捡了块骨头的野狗撒欢而去。天下坡的马路上一个人也没有，车行如飞。

站前的小旅店、小餐馆还没打烊，街头的小贩仍在叫卖。墙角下的暗影中已有乞丐铺开草帘子入睡了。仰望远处高岗上“老巴夺”烟草公司，那里灯火通明，夜班的工人还在干活。东边，极乐寺传来隐约可闻的晚钟声。

时近午夜，家里人还都没睡，老爸用他那因常年酗酒而

发红的老眼怔怔地望着我，嘴巴蠕动着却没说出一句话。我一阵心酸，不由得又是泪如雨下。老妈和妻子为我下的面条已经糗在了锅里。

小饭桌摆在了爸妈房间的炕上。四个人开始了相隔半个多月后的第一次晚餐。桌上的菜是干豆腐炒粉条、胡萝卜炒青椒，还有黄瓜蘸大酱。

为了儿子平安归来，老爸又举起了酒杯。

和我预料的差不多，我这一走，哈尔滨的家里翻了天。十天一过，我仍音信皆无，司令部副官处找到了我家。老爸和妻子也说不清我的去向，于是，江上军司令部便以“擅离军职逃亡罪”向全市以及营口市发出了通缉令。军、警、宪、特一齐出动，撒开网来，非要将我缉拿归案不可。他们大概是怕我投奔共产党的反满抗日武装，或是跑到苏联去。因为我知道的机密不少，对江上军，对日本关东军都十分不利，所以引起了司令部上下极大的震动。

我那可怜的老爸爸被迫举着一块二尺见方的木头牌子，天天去火车站上转几圈。牌子上写着：“奇峰吾儿，速归自首，以求宽大，否则身家难保！”寒风中老爸老泪横流，苦不堪言；家中妻儿老母哭作一团，只道我无论能否回来都是凶多吉少。

这类案件，只要叫宪兵、特务一沾上边儿，就必定没好。那伙豺狼一闻血腥味就会一拥而上，借机敲诈勒索，将家属监禁、拷打，不敲骨吸髓弄得你倾家荡产是决不会罢休的。

万幸的是，接触此案的人正是我的一个好朋友，此人叫杨翰林，是宪兵团的一个中士。他为人正派、刚直，素有修

养，待人接物彬彬有礼，从未听说过有什么恶行劣迹。他平时除了执行公务以外从不穿那身“虎皮”。买东西照价付款，不占别人便宜。许多商家和市井百姓都乐意和他交往。我和他是在一次朋友的婚宴上结识的。当时彼此都穿着西装，通过互换名片才知道了对方的身份、职务。交谈之下十分投缘，深感相见恨晚，遂成密友。这个杨翰林很讲义气，亲朋好友谁有困难、冤案他都能主动相助，利用自身的方便为人排忧解难，因此人缘、口碑极佳。

那天，杨翰林执勤回来，正遇见两个宪兵押着我老爸举着木牌子往火车站走。他大吃一惊，忙上前讯问，才知道我出了事。他立刻告诉那两个宪兵，这老人是他亲属，叮嘱关照一番后立刻又跑到了宪兵总队，拍胸脯担保一定能把我找回来。不知他用了什么办法，终于让上司相信了他，将此案接了过来，归他处理。

杨翰林一边通过各种关系打听我的下落，一边多次到我家安慰我的父母、妻儿。回去又向日本人汇报、撒谎，说已得到消息，我是在回来路上受了风寒病倒在半途中，很快就会病愈归队云云，将案子拖了下来，直到我回家。

我得知这一切，对杨翰林感激万分，庆幸自己交了这样一个肝胆相照的好朋友。

日本投降以后，我和杨翰林失去了联系，不知其下落。但我相信，这样的好人是会有好报的。在那些劣迹昭彰的警察、宪兵被老百姓在街头打得抱头鼠窜时，与杨翰林同样没有恶行的张再逢就脱下了警服站在人堆里看热闹，没有一个老百姓来找他的麻烦。

半个月的“逃亡”生涯，打碎了我升官发财的美梦，也加深了我对人生，对社会的认识。同时，明白了“朋友”这

两个字的分量。

第二天是星期五。日本人把这一天叫做“金曜日”，我认定是个吉日，决定到司令部去报到销假，以观动静。由于吉凶未卜，我没敢穿文官制服去上班，改穿一件协和服，挟着装了饭盒的皮包，心怀鬼胎地向司令部方向走去。

从后大门进了院子，我发现有无数双目光从四面八方向我投来，但没一个人和我打招呼。进入大楼，在前厅卫兵处，曲大胖子看见我咧开大嘴正要说话，被我用手势制止：以后再说。二楼静悄悄的，通勤车还没来，一进副官处，两个亲兵（勤务兵）立刻跳了起来，问长问短，和我非常亲热。这种时候，只有当兵的弟兄们毫无忌讳，因为在这个大楼里他们的职位是最低的了，再受什么牵连也不会降职的。

我的对头、老伙张副官进来了。见到我一愣，只噢了一声，连个招呼也不打就坐到了他自己的办公桌前，装模作样地整理桌面，看也不再看我。窗外有通勤车开到的声音，不一会儿，老处长矢野和宫崎也进来了。矢野处长笑眯眯地看看我，没说话。趁勤务兵给他倒茶的时候我走上前，鞠了一躬说：“报告处长，我回来了，迟误了五天，请求处罚……”把假条交回到他面前桌子上。

他点点头，说：“坐着去吧，回头再说……”站起来出去了。

宫崎对我的态度还是老样子，一边扒靴子鼓捣脚，一边顺口道：“你小子这些日子都跑哪儿去啦……”电话铃声响起来，是找他的。我趁机溜了出来，去顾问处秘书室找佐藤。没想到丰永也在这里。佐藤见我一露面，就赏了我一个大“脖溜”，喝道：“你小子这回可闯下大祸了！告诉你，死活

可就全仗着（指指北屋顾问室）一句话啦！”丰永也好心地叮嘱我千万要虔诚赔罪，半句话也不得马虎……

我见顾问还没来，转身又赶紧去人事处去见菅原。老处长菅原见我进来，像没看见一样面现怒容，闷头办自己的事，把我晾在一边。

我刚说了一句：“菅原少校……”就被他一声“住口”的怒吼，定在了那里。

当初我们的“男子汉协定”是准时归队，别给他惹麻烦，可我却误了这么多天，并且以“逃亡罪”的嫌疑惊动了宪兵和警察。军法处、情报处很快就查出了军用通行证的存根，老菅原因此受到了严厉斥责。如果不是我终于回来，逃亡罪一旦落定，他也将受到军法处置，说不定还得挨内田的竹剑。所以他的愤怒我完全理解，深感无地自容，真是太对不起他了。我几乎哭出声来，噙着眼泪退出了人事处。

事后，我多次去他家，用了不少大蒜和老酒去赔礼、谢罪。这是后话了。

最后，我不得不硬着头皮走向最难过的一道关：军法处，去领罪。

日本人少校军法官石突，龇着满口苞米粒似的大包牙，嘲弄地道：“好哇，我们的大翻译官回来啦！久违了。华北的娘儿们比东北的更有味道吗……知不知道你小子犯的是逃亡罪！军法无情呀，你是懂得法律的严肃性的。坐下谈谈吧……”在这走路都得侧身的办公室里哪有坐的地方。再说我这待罪之身，焉敢就座！于是，立正站着，听这瘦骨如柴的鬼子大放厥词，连讽刺带挖苦，把我羞辱个够。最后是：“没什么，回去静候佳音吧。”

军法处涩谷少校始终一言未发，抱臂端坐，面容严肃。

而那个小野仁藏则毫不掩饰自己幸灾乐祸的心态，满脸鄙视和奸笑，将办公桌上的笔和本子摔得啪啪响，得意得要放声狂笑了。此刻，他浑身上下都明白地写着潜台词：你小子，这回可栽到底啦！这下落到我手心里喽，咱们走着瞧！平时你与我同坐高台审问别人，如今你也成了阶下囚，受老子审了！

后来，还是涩谷少校说了一句：“左君，回去吧。一切都会正确处理的，走吧。”借这个台阶，我向他鞠了一躬，退了出来。

走廊上，那疯疯癫癫的宪原司令仍在自言自语地来回踱步，给我平添了无限的“闹心烦”。

大约十点左右，大厅卫兵处传来敬礼的口令声，我知道是内田顾问上班来了。

其实顾问大人本来也无公事可办。所以不到中午，汽车声响，他已经又打道回府了。

在这两个多小时里，我伸长了耳朵想探听顾问室的动静。知道佐藤曾用内部电话通知过矢野、菅原、丰永、石突等人去顾问室听令，详情不知。

中午，饭后的司令部一片宁静。我毫无食欲，带的午饭必馊无疑了。心里七上八下，十分难熬。一个人跑到楼顶的阳台上脱光了上衣晒太阳。远远望见老处长矢野又领着一伙人乘汽艇到江北游泳去了。江面风平浪静，骄阳下，只有“晋江”、“晓江”两艘炮艇泊在江心。

利用午休时间，我找到王人楷，在后楼门廊上将十个金元宝原封不动地交给了他。他又惊又喜，连连道谢，声言他日一定请我喝酒。但这个视财如命的家伙，至今连一碗面汤也没请我喝过。

下午五点，铃声响过，下班了。我为探听风声，悄悄溜向顾问秘书室，正好在侧楼梯口碰上了佐藤。他一边锁门一边悄声告诉我：“你小子命大，总算过了关。注意，还得去走走多莎子和夫人的门路，以确保今后无事……”

我一听，心里的这块巨石才落了地。回屋倒掉馊了的午饭，夹上皮包脚下生风，急步回家了。

今晚，我要再访内田公馆，巩固战果。

哈尔滨的夏夜依然如旧。秋林洋行一带还是一片歌舞升平、灯红酒绿的景象，和充满火药味的北平相比像是两个世界。东欧局势的变化和太平洋上的大海战对这里没有产生丝毫影响。

我和多莎子徜徉在林阴道上。她告诉我，今天早晨，父亲起床后她就向父亲替我求了情，妈妈也在一边溜缝，说好话。内田顾问已经答应网开一面，对我不予惩处了。佐藤的话得到证实，我明白，关口已过，只要不再犯毛病，估计不会有什么麻烦了。看来，上午应召进入顾问室的几个处室头头已经得到内田顾问的明确指示，放过我了！

不知不觉，晚风中的散步已过去了一个多小时，我急于向父母、妻儿报告平安喜讯，推说还要去同学家送信儿、办事，把多莎子送回了公馆门口。树影中，我禁不住在她光洁的额头上轻轻吻了一下。一股温馨的感觉使我几乎落泪，多么善良、单纯的女孩子啊……我嗫嚅地说：“我还没有勇气去见夫人，请代我向她致谢、问安吧。”

“一定，放心好了。”

我看着她走进家门，心中为自己有这么个异国的红颜小知己而骄傲、感激不已。看来，吉人自有天相，老天爷没有

亏待我。

五六天过去，什么事也没有。我忐忑的心渐渐平静下来，司令部里没人提过这码事，好像我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。

今天上午，军需官捧着木盘子给各处室送薪水。轮到我，我用发抖的手在领收单上盖了名章，接过自己装薪水的信封。一看封皮上的数字，呆了，逃亡半个月后，薪水居然一文不少，月薪七十八元外加军法处的津贴二十元，叫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！

老吹张副官的眼珠子像螃蟹眼一样拼命往我手里使劲儿，想看个分明。但他知道问人每月挣多少钱是日本人礼仪中的大忌，我将信封扔在桌角，满足了他的好奇心。

临下班，佐藤又把我叫去，领取了顾问部的津贴十元。我今天心花怒放，不是为了钱，而是为自己彻底脱险，渡过了鬼门关而庆幸。

于是，佐藤今晚无法去坐通勤车了。我把他拽到王麻子膏药店的后胡同，在一个小酒店里和他连吃带喝，醉了个一塌糊涂……